

中國崛起後的日本對中政策

蘇俊斌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中國的崛起已成為當今世界的熱門議題。尤其是對中國重要鄰國的日本而言，中國的崛起是威脅或是機會，仍是個爭論的議題。如何對應中國的崛起，則成為日本重要的議題。本文試著探討在中國崛起後，日本的對中政策與中日關係。本文首先檢討著中國的崛起對日本的衝擊，其次則是介紹日本在外交領域的政策制定；第三則是以博弈理論分析中日關係。

關鍵詞：中日關係、中國崛起、中國共產黨、外交政策、反日活動

壹、前言

近年來，中國的崛起已成為舉世注目的焦點。中國在快速的經濟成長下，也帶動著軍事力及政治力的提升。然而當中國崛起之後，首當其衝的就是其周遭國家，尤其是依照「雁行理論」而被視為東亞領頭羊的日本更是影響深刻。雖然中國的經濟崛起也帶動著日本的經濟成長，如許多中國大陸觀光客在日本大量消費的確是在刺激日本經濟，但是軍事與政治力量的增強卻相對地減低了日本的區域影響力，更何況日本長期遭受不景氣的困境。而中日間除了歷史糾葛外，還存在著不少的領土、資源爭奪的糾紛。所以中國的崛起對日本而言，是一個經濟上的機會，但同時也是一個政治軍事上的挑戰。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日，當中日兩國之間的交流更趨頻繁，這兩個世界上第二及第三大經濟體間的關係，不但影響到東亞區域的繁榮與安定，也對全球化的今日世界產生重大的影響。而在此決策決定的環境下，日本對崛起中國的外交政策，就如同在「賽局模式」(game theory)下兩強的對弈般，則成為當今日本最重要但也受爭論的政策議題。¹

貳、中國的崛起對日本的衝擊

當田中角榮這位現代「太閤」登上首相位置並完成中國與日本建交的1972年當時²，中國剛歷經了大躍進及文革的混亂時期，整個社會還是處於一窮二白的境界；相對地日本卻經過了1950、1960年代的高度經濟成長，已成為世界上的第二經濟大國。就在此互補的情況下，中日兩國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外交蜜月期。中共政權基於國際情勢以及表示對日本的善意，主張日本的侵華歷史，是少數軍閥所為，而一般日本百姓也是受害者，

¹ 本論文曾發表於「第六屆全球化與行政治理研討會」(2011年5月6日，桃園蘆竹開南大學顏文隆國際會議中心)，做若干修正；感謝評論人何思慎教授等先進的寶貴意見。

² 其實早在吉田茂首相時，日本就認為應該與台海兩岸政權建立同等外交關係，或是選擇北京是更勝於台北(王偉彬，2004：31；何思慎，2008：39)，但因礙於美國的壓力，日本不得不承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

所以並不打算向日本提出任何的賠償要求。當然也不否認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基於國際情勢對日本採取以德報怨並不得不放棄對日本的戰爭索賠（殷燕軍，1996），也是影響中共政權在與日本建交時採取寬大的政策。

在名義上，日本不需要對中國進行任何戰爭賠償，不過實際上卻提供了不少的金錢與技術的援助，尤其是日本對外所提供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中國是最大受贈國之一。而且當時的中日兩國經濟則處於互補階段，也就是中國廉價的勞力、天然資源及初級產品，正是可與日本的高科技產品做交換。

後來在 1980 年代中期，中日之間雖然發生過貿易不均衡的爭論、也因為中曾根康弘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及日本修改教科書而引起兩國間歷史認知差異之爭執、而大阪高院在光華寮案³上否認「一個中國」原則更引發中國的強烈抗議，但是大致上中日兩國的關係還算是平順的發展。而後當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日本人民對中共政權印象則明顯改變，而且日本政府也不得不隨著西方國家的腳步對中國進行一些制裁。但是日本政府又為了對中國表示善意，比起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更早解除對中國的制裁；在中日建交 20 周年的 1992 年時，縱使日本國內仍有一些反對聲音，尤其是擔心天皇會對戰爭認錯謝罪（黃大慧，2008：216），但在宮澤內閣的執意安排下，平成天皇成爲了史上第一位踏進中國領土的日本天皇，而這也成爲當時中共在外交上的最佳的突破口（中共錢其琛副總理之《外交十記》回憶錄）（鎌田慧，2009：2），並讓日本借重中國來增大對美的外交自主性（吳學文、林連德、徐之先，1995：259）。

另一方面，中國在 1978 年實施改革開放後，便一反過去共產制度下

³ 光華寮是位於京都的一棟的學生宿舍，二次大戰後由中華民國政府買下以解決當時中國留學生的住宿問題，可是許多居住在此的親中共留學生卻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所有權，尤其當日本承認中共之後，此一宿舍是否要移交中共，便成爲了棘手問題。本來大阪高等法院以「不完全繼承」的法理，認爲這並非是公權力財產，且中華民國政府依然存在台灣，所以判歸台灣所有（1987 年 2 月 26 日判例時報 1232 號 119 頁）。但是這被中共方面認爲是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所以就嚴厲抗議。後來拖到 2007 年，才由最高法院（2007 年 3 月 27 日判例時報 1967 號 91 頁）以訴訟資格爲由，雖然沒有明指光華寮的歸屬，但實質上以台灣敗訴收場（玉田大，2010：42-45）。

計劃經濟，引進了一些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並造就中國經濟快速起飛。後來又在 1990 年的波斯灣戰爭後，中國更了解到軍事現代化的重要，於是在逐漸雄厚的經濟力支撐下，中國的軍事力快速成長，尤其是爲了拉攏軍方而向軍方傾斜的胡錦濤政權更是明顯（清水美和，2009：175）。

中國軍事力量的快速成長，難免會給其他國家窮兵黷武的印象，甚至造成 1990 年代以來，「中國威脅論」⁴ 在日本及其他國家甚囂塵上（李建民，2007：86）。但是縱觀自鴉片戰爭以後近百年，中國就是因爲國勢衰弱，才淪爲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加強軍事力是爲了保護自己，甚至是恢復過去天朝榮景的重要方法。而中國政府與人民不只借著快速成長的經濟力量，也靠著強大的軍事力量，逐漸地加強自信心，其意圖成爲區域大國，甚至期待恢復漢唐時代之世界強權的雄心也昭然若揭。

中國的「大國崛起」雖然一再強調是和平的，但是如同過去其他國家的崛起一樣，中國的強權之路難免也會與其他周遭國家有一些衝突。在今日全球化趨勢與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之下，中國似乎不太可能像過去普魯士須發動普丹、普奧、普法戰爭，以及日本帝國需發動甲午、日俄戰爭般，以戰爭做爲崛起的階梯，可是與鄰近國家的利害衝突，卻是中國崛起難以避免的宿命。

在 1970 年代末期，中國雖曾進攻越南卻無功而返，但這是中國尚未真正崛起之際。然而當 1990 年代的時候，中國的國力已經是今非昔比時，中國就展現了更強烈的企圖心。首先在 1995 至 1996 年之際，中共政權以維護國家統一及主權的藉口，對台灣海峽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趁此也展現出強大的軍事力。不過此一舉動卻引起了美國的關切，使得中共到最後也只能草草結束。的確與美國相比，不管在軍事或經濟力上，中國依然

⁴ 在日本本土，共有 99 個美軍設施，而在琉球也有 34 個，所以總共 133 個，而在其他世界各地的美軍設施更是難以勝數。另外美國的軍事經費則是中國的好幾倍，而且美國也常介入世界各國的戰爭，又當美國反對其他許多國家擁有核子武器時，自己卻擁有強大的核武，這些都一再地顯示美國的軍事霸權。但是在日本卻少有「美國威脅論」，卻一再地提起「中國威脅論」，似乎難免被批判是蓄意操縱（人民の星 5603 號 2011 年 7 月 26 日）。

是相距甚多⁵，所以在後來的 1999 年中國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與 2001 南海軍機衝突事件上，中共政權似乎也只能雷聲大雨點小，先做臥薪嘗膽而忍氣吞聲。

可是相對地，日本並沒有如同美國般的強大國力，且與中國呈現更多的利害糾葛，所以中日關係就與中美關係呈現不一樣的局面。尤其自從江澤民上台後，反日愛國教育則成爲一股風潮，如在 1994 年制定「愛國主義教育實施要綱」，而在隔年又借抗日戰爭勝利 50 年，更是徹底地進行愛國教育（池上彰，2010：18）。似乎反日才能顯示中國的重新站起來，而這也與共產黨統治合法性有強烈的關係⁶。不過中國方面強烈反對如此言論，強調中國民族主義的一貫性，並無特別針對日本（劉江永，2007：100-10）。

只是在實際上，中國不只在課本上標榜著過去中國人抗日的悲慘歷史及英勇事蹟，媒體上的節目，不管是戲劇或紀錄片，抗日內容都是非常盛行的節目之一。這也使得不只中國人民對日本多不存在正面印象，而每當有外交及政治事件之際，中國政府常常對日本採取強硬的反對態度。例如

⁵ 中國崛起雖已成沛然不可擋之趨勢，而且在 2010 年又超越了日本成爲了世界上第二經濟大國，所以一時之間，所謂的中美共治之 G2 時代的到臨，似乎甚囂塵上。可是在實際上，中國的軍力不但落美國有 20 年（人民網，2011），而且個人 GDP 也不過美國的 1/10；更何況國際政治經濟的運作仍然操作在以美國爲主的西方國家手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大經濟組織世界銀行及 IMF。畢竟改革開放才 30 年的中國能有如此成就已經不易，要與稱霸世界百年的美國相比，仍是有一大段距離，所以過去在鄧小平時代，一直強調要「韜光養晦」，道理就是在此。例如中國在漢初，一直苦於來自匈奴的威脅，所以才有高祖慘敗於白登之事。而後則是歷經了呂后，文景盛世之休養，才有約 3/4 世紀後之武帝時代的衛青、霍去病擊敗匈奴的事蹟，更何況今日美國之強大是遠勝於昔日之匈奴。

⁶ 韋伯曾經將政權的合法性分爲傳統式、領袖魅力及現代的民主法治三種，但是當今中共政權既沒有民主選舉，毛澤東、鄧小平的魅力型領袖也不復存在，又難以如過去王朝建立傳統的權威統治，這就影響了其統治的合法性。所以除了靠黨政密麻麻的統治監督系統外，維持高度的經濟成長以滿足人民的「生存權」，以及強調與共產黨領導結合的民族主義，則成了當今中共政權合法統治的根據。尤其是民族主義通常是誕生自外國的占領與壓迫（Roskin, *et al.*, 2006: 105），而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就履受西方侵略，且共產黨實際參與的對外戰爭就只有對日抗戰，所以當今中國高漲的民族主義是絕對不會缺乏抗日這一環。

當日本想要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的時候，中國便明顯地採取不支持的態度。而在沖之鳥的島嶼認定上，中國則與日本處於完全不同的立場。尤其是 2010 年的釣魚台漁船事件衝突上，中國更是強悍地表示領土保衛立場，最後迫使日本政府在中國漁船船長處分上，罕見的以外交考量壓過司法自主的立場，釋放了被捕的船長。也因為中國人民對日本充滿著負面的印象，所以反日活動在中國可說是極為頻繁，2005 年中國的大規模反日活動，仍是使人記憶猶新。

因此從 1990 年代中期起，日本開始重新檢視此一崛起但不十分友善的強鄰。畢竟對許多日本人而言，中國對日本的強硬態度，不過是中國內部的鬥爭工具，卻強把日本當標的⁷。在政治外交領域上，為了對應中國的強大，日本對東海區域安全問題則逐漸轉硬，如被視為在控制亞太地區政治安全格局的美日同盟問題（張歷歷，2006：461）。尤其受到 1995 至 96 年的台海危機衝擊後，日本政府也更關切台海問題並重視美日安保（五百旗頭，2006：252）。例如雖然中共政權強力的要求，日本政府不但不願意承諾中共以明顯地表明不支持台灣獨立、一中一台與兩個中國、以及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的「三不政策」，而且在「周邊有事」的定義上，是否包括台海在內，也從刻意保持模糊（毛里和子，2006：130），到後來則公開把它也包括在內（中國網，2011）。在剛公布的 2011 防衛白皮書，多達 22 頁（防衛省自衛隊，2011：75-96）便是在論述中國的軍事快速強大，以及對周遭國家的威脅，並且強調要與美國做更多的軍事合作（讀賣新聞 2011 年 8 月 2 日）。而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強烈的不滿，認為中國的擴大軍備及海洋活動一直是循著和平發展的路線，且強化國防不過是為了保障主權及領土而已（中共國防部發言人耿雁生）。而中國的發展，更是帶給日本及

⁷ 例如中曾根前首相便明白的表示他之所以在中國的強烈抗議下停止參拜靖國神社，目的就是要讓與他友好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不要成為政治鬥爭的攻擊目標（中曾根康弘之『自省錄』）。不過很可惜的，胡耀邦的親日態度仍被視為是下台的原因之一（池上彰，2010：23）。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中共的官員敢像台灣的一些領導人一樣，對日本採取極為友善的立場。例如被視為是日本通的王毅原駐日大使，卻鮮能展現親日的態度，其擔任國台辦主任，也被日本媒體質疑是要來阻礙台日關係的發展（產經新聞 2008 年 6 月 3 日），雖然這是沒有明白的根據。

世界各國重要的機會，並不會對任何國家產生威脅（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讀賣新聞 2011 年 8 月 4 日）。

另外在經濟上，中日兩國的互補性，也因為中國經濟快速成長，雙方逐漸成為競爭態勢，尤其是對資源的爭奪更為明顯。而被視為是世界工廠的中國，一直也是日本海外投資最重要的地點，卻在日本國內經濟一直衰退之今日，反而被視為是日本產業空洞化的重要原因（德重昌志、日高克平，2003：258）。且日本雖從中國大量進口貨品，可是其安全性問題卻是一直讓日本人民憂心，尤其在日本媒體的炒作下，日本是對中國產品充滿著歧見，縱使真相並不是這麼的糟⁸。因而自從 2007 年後，中國雖已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國，可是隨著兩國間經貿的頻繁往來，使得更多的問題反而浮上檯面。

就在中國崛起後，居然使得中日兩國更不具有好感⁹，但是又得互相依靠的情況下，其外交的發展就顯得非常微妙。而在此政策制定環境下，日本政府真得制定既競爭又合作的對中政治。

⁸ 例如在 2008 年發生毒餃子事件後，日本對中國的產品的安全性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媒體也大為報導。可是實際上日本的中國進口品之安全程度並不比其他國家來的差。例如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醫藥食品局食品安全部的『輸入食品安全統計』（2007 年），中國製造的進口食品中只有 0.42% 不合格，比起美國的 0.65%、法國的 0.55%、義大利的 0.66%，以及台灣的 0.84% 不合格率來的低。

⁹ 根據 BBC 在 2010 年 4 月所公布的民調（BBC World Service Poll, 2010），只有 18% 的日本人對中國持有正面的印象，但是卻有 38% 的日本人持負面印象。相對地中國則有 29% 的人民對日本持正面印象，卻有 47% 不具好感。不過根據此一調查資料，對中國持正面大於負面印象的國家幾乎都是開發中國家，例如肯亞、埃及、巴西等等；但是先進國家如德國、法國、美國之人民對中國持負面印象的比率則遠遠高過其正面印象的人民。至於對日本的想法，似乎也只有中國人民持正面印象遠低於負面印象比率。各國人民對中日兩國的印象調查：

對日本之印象

	中國	日本	南韓	俄國	美國	德國	法國	英國	泰國	澳洲	巴西	肯亞	埃及
持正面者%	29	45	64	58	65	50	48	40	66	59	70	68	54
持負面者%	47	7	29	13	11	34	37	38	20	22	19	15	18

對中國之印象

	中國	日本	南韓	俄國	美國	德國	法國	英國	泰國	澳洲	巴西	肯亞	埃及
持正面者%	81	18	34	42	29	20	24	57	45	36	52	73	64
持負面者%	8	38	61	31	51	71	64	16	44	43	35	15	21

叁、中日兩國之外交政策的制定

在公共政策上，政策如何制定往往比政策的內容與影響來的重要(Dye, 2008: 31)，所以外交政策如何且由誰制定，正是日本對中政策的核心。不過由於外交政策的決定是一種對弈，所以日本在制定中國政策之際，不可能忽略掉中國如何制定對日政策。

在中國大陸的政府決策上，眾所皆知的是在共產黨一黨支配政治下，黨的決策是可貫徹在政府部門上，例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策是可直接要求外交部去執行，而且在缺乏西方民主選舉機制度下，外部的利益團體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雖然在毛澤東、鄧小平時，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鬥爭也是相當激烈，尤其是文革混亂期，幾乎讓中日交流呈現停止狀況，但基本上決策仍是定於一尊。不過此一現象在江澤民掌權後就逐漸消失，就算是現在的胡錦濤，或是將來預定接班的習近平，權力平衡下的集體決策現狀將持續下去。也就是中共的外交決策還是掌握在極少數黨政菁英份子手中，但是這些菁英已呈現多元狀態，所以被稱為「多元菁英」(pluralistic elitism)的決策模式(Laio, 2006: 3)。

至於外交政策原則上，自從冷戰以後，共產主義理念逐漸消逝且不再輸出，而在改革開放後，中國又引進了許多資本主義制度，所以領導者在國際政治的基本認識上，則是基於現實主義(高原明生, 2010: 47)，並受經濟導向所影響。只是中共政權過於強調民族主義，要是碰到歷史認知，主權領土問題，卻是採取異常強悍的態度。例如被認為較現實理性的胡錦濤，碰到強硬派利用反日愛國運動來挑戰其權威時，他也不得不讓步妥協，這也造成中國對日政策一直必須強硬。

相對地在日本的公共政策制定上，雖說是較為民主多元，但是一般而言都是由官僚、利益團體(尤其是商業團體)、政治人物所構成的「鐵三角」在決定，所以外交政策的決定也是脫離不了這種模式。在外務省裡面，有所謂的「中國幫」或「中國學院派」(China School)的外交官是專門負責中政策；而官僚又因為能夠將其意志直接反應在政策上(岡田浩、松田憲忠, 2009: 81)，所以日本的對中政策細節實際上是由官僚在主導。

由於中日關係影響重大，日本政治人物也常常利用中國政策來成就其政治上的表現，所以常常主導重大決策。例如過去的田中角榮首相便是一手主導日本與中共的建交；而小泉的「官邸外交」往往是越過官僚作決策，尤其是田中真紀子外相的讓外務省陷入「機能不全」（佐道明廣，2008）。而最近最有名的爭議就是鳩山由紀夫首相在「友愛外交」下，希望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建立一個東亞共同體，所以同意民主黨的實力派人物小澤一郎幹事長基於中國的實力以及對日本的重要性考量，不顧（宮內廳）慣例而特別在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日之際，破例安排平成天皇會面。這些都再三地顯示政治人物在包括對中政策的外交決策上，拿下主導權的意圖。畢竟依照日本的民主運作模式，本來就是要由選舉出來的政治人物負責決策，官僚則是負責執行。

在政治人物中，對於中國的看法也不盡相同，這也是延續戰後日本外交路線上的「亞洲派」與「親美派」之爭（何思慎、陳舜仁，2009：8）。部分基於現實考量，往往採取對中國比較友善的政策，並且頻繁地到北京訪問，只是彼等在接受中共政府的熱烈款待下，又常常失去了自我的立場，因此被批評是到北京朝拜（古森義久，2003：26）。另一方面，對中國強硬的政治人物並非少數，如小泉純一郎首相便是不顧中共的強力反彈，一再地參拜靖國神社。被中國媒體指（環球人物 2010 年 28 期）為是日本三大鷹派的民主黨前原誠司議員更直接明言：「中國以經濟發展為背景而增強其軍事力，並且進行現代化，這是現實的威脅，所以與中國就必須要有對話與關係，以及壓抑的兩面對應手法。」（2000 年 12 月在美國的演講）。只不過又為了顧及中國的反應，民主黨則統一意見表示：「未有對中國之威脅的認識」（田久保忠衛，2010：207）。另外如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被視為是反中右傾的政治人物，而「站起來，日本」政黨的代表平沼起夫之保守右派立場更是有名，所以對中國不具好感也是不言可喻。而每當日本在制定對中政策的時候，政治人物往往基於正反兩方面在互相激盪。

至於日本的企業在中國不只有龐大的投資，而且還有大量的貿易往來，所以企業團體在日本的對中政策上當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例如政

商團體中的「日中友好協會全國本部」、「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日中友好議員連盟」、「日中經濟協議會」、「日中協會」、「日中友好會館」常被視為是顯著的親中七團體，積極地在推動中日間的交流（古森義久，2003：111）。

雖然對中政策是文官、利益團體、政治人物所構成的「鐵三角」在主導，但這並非意味著這些領導菁英能夠為所欲為，畢竟中日關係不只影響日本巨大，還牽涉整個亞太政治情勢，所以當日本政府要制定對中政策之際，除了要依照領導菁英的長期個人考量外，大眾的民意也是不容忽視¹⁰。

另外來自外國的影響，除了中國本身，更包括著與日本有安保關係的美國，以及與中國有直接關係的台灣，甚至是東協國家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尤其是美日的同盟關係，一直是日本在執定外交政策上的重要限制，所以吉田內閣為何要選擇承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原因就是在此。雖然戰後至今已逾一甲子，而日本也屢次標榜要邁向正常化國家，可是在實際上，美國對日本的影響仍然巨大。不只從日本國內本身的利益而言，就連日本在國際舞台的角色，也要靠世界警察美國的支持。而歐巴馬總統的「重返亞洲」，日本就是明顯地加以協助，當中則不乏牽制中國的意味（環球日報 2011 年 6 月 27 日）。

所以日本的外交決策，尤其是牽涉甚廣的對中國政策，由於充滿著許多複雜且不明的因素，並非單純領導菁英可以充分決定。所以當中日兩國日趨緊密之際，日本的對中政策也可說是在草野厚（1997）教授所謂的「相互浸透模式」下展開。

¹⁰ 雖說一般民眾在許多政策領域上顯得茫然無知，但是如果政府決策悖離民意甚遠的話，下次選舉就會受到來自民眾的懲罰。相對地，掌握公權力及諸多資源的政府也可操縱民意以符合他想要的，但是在多元民主的日本，不管誰來執政，一定存在許多反對政府政策的聲音，絕對不可能有戰時「舉國一致」的情況；而且日本近年來內閣更換頻繁，除了小泉首相成功地演出了其「劇場政治」外，其他首相似乎對此乏善可陳，這也是造成他們匆匆下台的原因之一。

肆、賽局理論下的中日關係

當中國崛起後，兩國實力日趨相當，其競爭性就更為強烈，就如同在賽局理論下對弈的兩方。也誠如新加坡李光耀資政所指出，這是史上第一次兩強並立的時刻，「一山不容二虎」的態勢似乎於焉形成，在此狀況下，日本對中政策就不得不做調整，不能再如蜜月期時的互補關係一樣。

而所謂賽局理論最根本的就是探討兩個實體間若有利害衝突發生時，該如何利用謀略並加以理性的計算，以求得利益的最大化，從而在競爭中生存。這也剛好符合外交上是為了追求國家利益，因而顯得自私自利之基本原則（Roskin, *et al.*, 2006: 377）。而日本在中國政策上，基本上也是使自己獲得最大利益。

由於中日兩國仍然互相依賴，對日本而言，首先希望和平共存，但是如前所述，民族主義高漲的中國，民族自尊、領土、主權議題則是最基本的外交原則之一（高原明生，2010：48），所以一直以強悍立場在雙方爭執點上以逼日本退讓；更何況兩國不只分屬不同型態的政治制度，而且還具有不同的文明傳統（Huntington, 1998），所以對許多事情的認知完全不同，衝突因而難以避免。

一般而言，公共政策依照其內容及實際影響，大致上可分為具有實質（*tangible, material*）利益及象徵性（*symbolic*）意義兩種（Roskin, *et al.*, 2006: 377）。若將此理論應用在中日外交問題上的話，前者就如領土歸屬問題，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釣魚台問題，這不僅涉及到釣魚台本身之主權，還關係到附近海域漁場，以及據傳有豐富的海底石油。而後者則如歷史認知問題，像日本教科書上記載過去日本是「侵略」或「進出」亞洲，以及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由於這兩種性質不同的政策對日本會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日本政府對應方式也有所不同。

假設在爭執問題上，簡單化為妥協及強硬兩種態度，這就如同「囚人困境」定律般，如果是彼此妥協合作下，可以各得 1 點，但是彼此強硬而造成衝突的話，就要各得負 1 點。若是一方強硬，另一方妥協退讓，強硬

的一方可得 2 點，但是妥協的一方卻是 0 點，當然得損的大小是要看問題的性質及當時的狀況而定，這是做粗略的計算。而由於現今資訊流通越來越快速，中日雙方領導的溝通管道也越來越多，比較不會如「囚人困境」般，對於對手的策略有不明之處。但是外交政策決定並非決策菁英可以完全自行決定，畢竟這還牽批涉到複雜的國際情勢及國內民情；而各國政府的外交底線，也不會輕易透露。

首先以釣魚台之領土爭執來說明日本政府的決策，由於釣魚台問題，對日本之利益影響甚巨，所以日本一般都採取強硬態度。雖然日本政府在小細節上或許對中國採取妥協，如釋放中國船長，不過這卻是重創菅內閣的舉動。因此這也被視為是在賽局理論上失敗運用，畢竟逮捕後再被迫釋放，不如當場強勢驅逐而少生紛爭（現代ビジネス研究會，2011：78）。但是在大原則上卻不予妥協，所以日本官員一再地重申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而海巡隊也不斷地捍衛巡視鄰近海域。而中國方面，雖然強力譴責日本，並且重申對釣魚台主權，但仍未敢直接派兵奪回釣魚台，因為這絕對會關係到美日安保，畢竟美國立場上基本是傾向日本，中國難以占到便宜，所以維持現狀，各自表述，也就是在實際上是各自採取妥協的立場，似乎是中日雙方在釣魚台問題上的「納許均衡」。

表 1：賽局理論下的中日對釣魚台問題之對弈

		中 國	
		妥 協	衝 突
日 本	妥 協	1, 1	0, 2
	衝 突	2, 0	-2, -2

對於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所引發的歷史認知問題上的爭執，雖然表面上這不過是象徵性質的問題，但是民族主義強盛的中國卻不敢在此問題上輕忽。這不但是中國民眾會有激烈反應，更是鷹派及鴿派用來鬥爭的工具，中國的領導菁英絕對知道利害之所在。相對地，當日本覺得這問題由於只是象徵性質而已，一直多以妥協立場為主，所以如中曾根首相便是在中國的抗議下，不再參拜靖國神社。

可是當日本民眾對國際事務的認知，已從 1980 年代以亞洲為重心轉移到以西方國家為重心後（Shibuichi, 2005: 211），小泉首相便不再對此問題妥協，更何況遺族會之第二次大戰戰死者的家屬是小泉的重要權力來源。縱使來自中共的文攻武嚇、口誅筆伐，並使得中日關係不斷惡化，小泉的高人氣在日本似乎不受影響。小泉也成為中曾根以後唯一能夠在位長達 5 年的首相，且在其領導下，自民黨在 2005 年眾議院選舉中大勝並延續其政權。

基本上在象徵性的政策議題上，通常是中國強硬，日本妥協。例如繼任小泉的安倍晉三首相則採取了對中和解的態度，並不再參訪靖國神社，雖然安倍是屬於保守派政治家且在外交上重美輕亞（黃大慧，2008: 86-94）。而至當今的野田佳彥首相為止，後小泉時代的日本首相未曾再踏入靖國神社。相對地，中國方面也由總理溫家寶展開訪日的「融冰之旅」，而後又繼續恢復兩國的首腦會談。畢竟兩敗俱傷不如互相妥協。對日本而言，為了換取中國善意，在這種象徵議題退讓也沒有重大損失，只是難免讓人感覺日本彷彿是賽局上的「弱雞」。

其實中日若是嚴重衝突，中國也未必占到便宜，目前的狀況也不太可能發生戰爭，最多就是貿易、文化交流中斷，還有中國頗受爭議的對稀土出口限制¹¹。可是既然中日兩國是經濟互相依賴，不可能是中國片面主導。例如雖然有些報導認為如中國觀光客對日本產生不少刺激景氣的效果，但是日本觀光客到中國的人次卻更勝於中國來日本的觀光人次，而中國對日本的投資則遠少於日本對中國的投資，更何況中國對日本還呈現出超。又假設中日一旦有了軍事衝突，美國的立場已經是不言可喻，中國的領導菁英絕不可能不明白這些因素。因而當小泉不肯在靖國神社問題退讓而讓雙

¹¹ 在中日因為釣魚台發生糾紛時，中國就擬以限制稀土輸出來制衡日本，因為工業大國日本的絕大部份稀土是來自中國，可是後來世界貿易組織居然判定中國的限制稀土輸出是違反「內外無差別」的國際原則，等於是對中國的外交手段一個嚴重打擊，不過日本政府卻沒有參與這次的訴訟（產經新聞 2011 年 7 月 7 日）。另外，雖然中國占了世界 9 成的稀土生產量，不過根據東京大學加藤泰浩教授的估算，其埋藏量卻只佔世界陸地埋藏量的 5 成（東京ロイター 2011 年 7 月 4 日），畢竟稀土是要非常傷害環境才能開採的珍貴礦產，所以許多國家都偏向備而不用。

方關係惡化，也不過是「政冷經熱」而已，中國並不致於抵制雙方經貿往來。畢竟崛起的中國，仍然存在極強的脆弱性，這除了中國國內仍然存在諸多如貧富差距擴大、少數民族獨立運動等問題外，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也利用人權、民主等議題在壓抑中國。所以中國與其以強硬態度試圖將其利益最大化，更宜採取合作賽局（cooperative game）模式。

而日本方面，若是純粹從自己的利益著眼，不一定在象徵性議題上，就要採取退讓態度。反而存在著「威嚇」（deterrence）條件且採取較為強硬態度的話，更容易使去除意識形態而趨於理性決策的中國，步向彼此妥協的境界。尤其從軍備角度來看，經過「憲法變遷」的第9條和平主義規定，對自衛隊的約束已越來越小了¹²，而自衛隊也是當今世界屈指可數的軍事力量。

伍、結論

自古以來，任何國家的崛起，往往破壞了區域的權力平衡，所以常常要以戰爭來證明。只是今日國際情勢，中日兩強靠著戰爭來爭奪東亞霸權地位的機會是微乎其微，不過例如在經濟、文化領域上的小型衝突，卻是難以避免。但是話又說回來，在工業技術，以及經濟領域上，兩國的發展仍是有所差距，所以互補作用仍未完全消除。縱使中國在許多議題上保持強硬態度，但這也不過在應付國內壓力，所以都不至於把局面弄得太僵。要是中國硬要強勢對抗日本，到最後反而引來美日聯手，是對中國的傷害

¹² 本來依照日本憲法9條的「和平主義」規定，日本不只能發動戰爭，也不許擁有軍力，可是日本在實際上不只有強大的自衛隊，也與美軍有安全保障協定，所以常常引起違憲的爭議。而日本的軍力擴充也引起了周遭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反彈，但若其於日本自己利益考量，軍事力是在國際上自保的重要工具，這也是中國急速擴大軍備的理由，當然美國的支持也是日本軍力重整的要因。為了解決憲法上的爭議，日本政府一向做合憲解釋，法院的判決中，雖有地方法院針對美日安保條約中駐留美軍（東京地方法院1959年3月30日判例時報180號2頁）及自衛隊（札幌地方法院1973年9月7日判例時報712號24頁）做違憲判斷，但是最高法院卻從未對此有違憲的判決。另外在學界，則以這是行之多年且獲得國民理解之違憲狀況的「憲法變遷」理論來解套（橋本公巨，1988：438-40）。

更大，中國的領導菁英應該十分明白。尤其是今日中國的崛起時點，許多世界秩序已置於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制定的框架下，中國也不得不遵守，縱使它仍有一些微辭。

相對地，日本大略上雖然有親中及保守右派兩股勢力在對中政策上激盪，但是執政者及政策執行者，已漸熟知如何在此一問題上獲得最大利益或是損害最小，甚至也如前原誠司所言在玩兩手策略，在中國未崛起時是採柔性對應，在中國強大後，卻是軟硬兼施。只是最重要的，外交是內政的延長，日本對中政策的基本籌碼仍在自己的國力，若日本經濟再持續失落下去的話，不只對中國，對外的影響力也會持續減弱。

附表 1：中日兩國國力以及與台灣的關係

	中 國	日 本
面積，千 km ²	9,640.8	377.9
人口，百萬	1,337	128
GDP，10 億美金	5,745 (2)	5,391 (3)
個人 GDP，美金	4,382	42,783
基尼係數	41.5	38.1
軍事支出，億美金	988 (2)	469 (6)
平均壽命	73.1	82.3
外匯存底，%	19,492.6 (1)	10,093.6 (2)
第一二三產業比例，%	44.8，23.8，31.4	4.4，27.9，66.4
出口貿易量，億美金	14,285 (2)	7,823 (4)
進口貿易量，億美金	11,330 (3)	7,620 (4)
我國出口額，億美金	769	180
我國進口額，億美金	359	519
來台旅客人次	1,630,732	1,080,153

說明：本表資料以 2010 年為主。括號為世界排名。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2011）、交通部觀光局（2011）、Wikipedia（2011）、21 世紀中國總研（2010）。

附表 2：中日及相關美軍的軍力相比

	中 國	日 本	駐日美軍	美國第七艦隊
軍 隊	160 萬	14 萬	1.9 萬	
軍 機	2,040 架	430 架	140 架	60 架
軍 艦	134.1 萬噸	44.8 萬噸		33.6 萬噸

資料來源：防衛省自衛隊 (2011)。

參考文獻

- 21 世紀中國總研（編），2010。《中國情報ハンドブック》（2010 年版）。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
- 人民の星 5603 號 2011 年 7 月 26 日。
- 人民網，2011。〈解放軍總長陳炳德坦言中美軍力差距 20 年〉5 月 19 日 (<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4686557.html>) (2012/2/29)。
- 中国網，2011。〈日本が周辺事態法を改正へ関係国は注意が必要〉1 月 25 日 (http://japanese.china.org.cn/politics/txt/2011-01/25/content_21815981.htm) (2012/2/29)。
- 五百旗頭（編），2006。《戦後日本外交史》（新版）。東京：有斐閣。
- 日本厚生労働省醫藥食品局食品安全部，2007。《輸入食品安全統計》 (<http://www.mhlw.go.jp/topics/yunyu/tp0130-1am.html>) (2011/12/25)。
- 毛里和子，2006。《日中關係：戦後新時代》。東京：岩波書店。
- 王偉彬，2004。《中國と日本の外交政策：1950 年代を中心にみた国交正常化へのプロセス》。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
- 古森義久，2003。《日中再考》。東京：扶桑社。
- 玉田大，2010。〈光華寮事件〉收於杉原高嶺、酒井啓亘（編）《國際法基本判例 50》頁 42-45。東京：三省堂。
- 田久保忠衛，2010。〈外交問題〉收於自由國民社（編）《現代用語の知識 2010》頁 201-209。東京：自由國民社。
- 交通部觀光局，2011。《觀光統計圖表》 (<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315>) (2012/2/29)。
- 池上彰，2010。《そうだったのか？中國》。東京：集英社。
- 何思慎，2008。《敵乎？友乎？冷戦後日本対華思路的探索》。台北：致良。
- 何思慎、陳舜仁，2009。〈日本亞洲外交下安全戰略途徑〉收於楊永明（編）《新世紀日本體制的再轉型》頁 1-46。台北：翰蘆。
- 佐道明廣，2008。〈小泉純一郎：戰略なき外交の決斷と實行〉收於佐道明廣、小宮一夫、服部龍二（編）《人物で讀む現代日本外交史》頁 320-34。東京：吉川弘文館。
- 判例時報，1959 年，180 號，頁 2；1973 年，712 號，頁 24；1987 年，1232 號，頁 119；2007 年，1967 號，頁 91。
- 吳學文、林連德、徐之先，1995。《當代中日關係 1945-1994》，北京：時事出版社。

- 李建民，2007。《冷戰後的中日關係》。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 防衛省自衛隊，2011。《平成23年度日本防衛・防衛白書》。東京：ぎょうせい。
- 岡田浩、松田憲忠（編），2009。《現代日本政治：政治過程の理論と實際》。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
- 東京ロイター 2011年7月4日。
- 殷燕軍，1999。《中日戰爭賠償問題 中國國民政府の戦時・戦後対日政策を中心に》。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 草野厚，1997。《政策過程分析入門》。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高原明生，2010。〈中國外交の政策〉《日本貿易月報》684號，頁47-50。
- 張歷歷，2006。《百年中日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清水美和，2009。《中國問題の核心》。東京：筑摩書房。
- 現代ビジネス研究會，2011。《ゲーム理論がイチからわかる本》。東京：すばる舎。
- 産經新聞 2008年6月8日。
- 黃大慧，2008。《日本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經濟部統計處，2011。《經濟統計指標》（<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Indicator/wFrmIndicator.aspx>）（2012/2/29）。
- 劉江永，2007。《中日關係20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徳重昌志、日高克平（編），2003。《グローバルイゼーションと多國籍企業》。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
- 橋本公亘，1990。《憲法》（新版）。東京：弘文堂。
- 環球人物 2010年28期。
- 環球日報 2011年6月27日、2011年7月7日。
- 鎌田慧，2009。〈マスコミに巣くう「親米派」と天皇を政治利用する政治家たち〉《月刊「記録」》348號，頁2。
- 讀賣新聞 2011年8月2日、2011年8月4日。
- BBC World Service Poll. 2010. "Global Views of United States Improve While Other Countries Decline." April 10 (http://www.globescan.com/news_archives/bbc2010_countries/BBC_2010_countries.pdf) (2012/2/29).
- Dye, Thomas R. 2008.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12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8.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Laio, Xuanli. 2006.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ink Tank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Roskin, Michael G., Robert L. Cord, James A. Medeiros, and Walter S. Jones. 2006.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 Shibuichi, Daiki. 2005. “The Yasukuni Shrine Disput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Japan.” *Asian Survey*, Vol. 16, No. 2, pp. 197-215.
- Wikipedia, 2012. “List of countries by GDP (nominal)”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GDP_\(nominal\)](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GDP_(nominal))) (2012-02-29).

Japan's China Japan Policy after China's Rise

Chun-Pin S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e rise of China is a hot issue in the modern world. Particularly for Japan, which is an important neighboring country of China, whether China's rise is a threat or opportunity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How to deal with China's rise has, therefore,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Japa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udy Japan's China policy and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after China's rise. Firs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China's rise on Japan. Secondly, it introduces foreign policy making in Japan. Thirdly, it analyzes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under the game theory model.

Key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rise of Chin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eign policy, Anti-Japanese Campaign